

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 倡议书

人类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人类学传入中国已整整一百年了。

一百年来，从蔡元培先生介绍民族学开始，在老一辈人类学家们的培育下，中国人类学以高水平的态势进入国际人类学界，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了费孝通、岑家梧、杨成志、江应樑、林惠祥、梁钊韬、李济、凌纯声、潘光旦、许烺光、林耀华等人类学大师，他们以他们不朽的人类学著作为中国人类学争得了国际性的荣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在人类学本土化方面在台湾得到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发展，涌现了陈奇禄、张光直、李亦园、乔健、杨国枢、吴燕和等人类学大师，他们以他们本土化的人类学著作为中国人类学争得了国际荣誉。

暴风雨过去后的阳光最灿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人类学迎来自己的春天，在大陆重新崛起。与此同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也有了新的发展。放眼中国人类学界，除了

容观复、阮西湖、黄淑娉等老一辈的人类学家青春焕发以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类学家，如台湾的庄英章、黄应贵、陈祥水等，香港的陈志明、蔡志祥、张兆和、廖迪生等，大陆的郝时远、马戎、杨圣敏、庄孔韶、王建民、王铭铭、蔡华、周星、麻国庆、高丙中、景军、张小军、纳日碧力戈、何星亮、周大明、何国强、钟年、尹绍亭、和少英（排名不分先后）等。他们意气风发，也以他们充满锐气的人类学著作正在为中国人类学争取新的国际荣誉。

今天，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 21 世纪。面临 21 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为了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倡议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平台，邀请国内外的人类学者进行学术讨论。

人类学高级论坛以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为宗旨，定期（每年或隔年）举行一次。在论坛上根据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需要将以“主题论坛”、“高峰论坛”、“国际论坛”、“专题论坛”、“学术沙龙”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展开学术讨论，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高级论坛根据参加单位的要求，确定举行论坛的时间和地点。为了保证论坛的高规格和高质量，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经费由当年的主办单位筹集解决。

鉴于 2002 年 5 月是广西民族学院建院 50 周年纪念，根据广西民族学院的要求，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将于 2002 年 5 月中旬在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召开，有关论坛的组织工作由广西民族学院负责。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上海大学文学院
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东华大学（台湾花莲）原住民族学院
佛光大学（台湾宜兰）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
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研究所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

2002 年 3 月 1 日

致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

费孝通

今年正值广西民族学院建院 50 周年，同时 2002 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民族学院举办，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此我想重复一下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时我曾讲过的话，用以和在座的人类学同人们互相勉励，在 21 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些什么？——这成了我们的学科必须细致思考的问题。而这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假如我们的学科，要对 21 世纪的进程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它就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学科基础。在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里，这样的基础显然还需要我们去打造，而我们同时却又需要为建造“和而不同”的世界做贡献。学科发展时间与历史发展时间的“脱轨”，必然会使我们觉得措手不及。但是，这也许就是新的世纪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科的新挑战。

最后预祝会议成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费孝通' (Fei Xiaotong) followed by a date '10/8'.

致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

李亦园

欣闻 2002 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将于 5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本人原拟出席参加，但因健康尚未完全恢复，医生嘱咐避免远行，因此不能亲身与会，失去一次与国内外人类学同行聚会请益的好机会，十分可惜，也深感歉疚，特致电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全体同仁健康愉快。

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界至为活跃，聚会频繁，论题广泛，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亦园忝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之一，前此能够有不少机会参与活动，至感荣幸欣慰。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人类学研究最佳园地，全国不但有 55 个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供比较研究，即使汉民族文化也因区域广大，人数特多，所以地方性小传统又化的表现特别复杂，更是难得的研究园地，所以国内的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工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

李亦园敬启

2002. 5. 10

于台北南港中研院

在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欢迎词

万辅彬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学者，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在广西民族学院美丽的相思湖畔，我们迎来了首届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召开。在此，我谨代表学院党政领导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和我们共同发起倡议举办论坛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东华大学（台湾）原住民族学院、佛光大学（台湾）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等单位，对辛勤筹办论坛的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衷心的感谢！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虽几经起伏，但因为有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人类学大师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六七十年代台湾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示范性工作，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在增加、研究队伍在壮大，一大批中青年人类学家，

正意气风发，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加。以我们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成长为例，从 1953 年设立教研室开始，到 1956 年组建民族问题研究室，1984 年升格为民族研究所，再到 1997 年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机构的规格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办学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人才队伍不断扩大。1988 年开始招收专科生，1995 年招收本科生，并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998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了一支由张有隽研究员、范宏贵教授、徐杰舜教授和周建新博士为学术带头人，包括一批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受民族学人类学系统训练的博士、硕士为主的学术队伍。民族学学科于 1996、2001 年两次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作为广西惟一设有民族学专业的高校，广西民院的民族学学科是研究我国华南、西南各民族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各民族的重要阵地之一，其中壮族、瑶族和汉民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再以我院学报为例。我院学报（哲社版）自 1995 年改版以来，大量刊发处于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稿件，两次被评定为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并入选广西十佳社科期刊，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得到了国内外人类学界广泛的好评，成为刊发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从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我院学报（哲社版）的成长历程，尤其是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我深深感到，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人类学在中国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面对 21 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例如，当前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使国际社会生态蒙上阴影；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也成为比较艰难的事。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和追求，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各个地区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还有克隆人的问题，也引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人类学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

题，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设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在座的人类学专家们为人类学的发展再立新功、再铸辉煌！

再过几天，5月18日，广西民族学院将迎来50华诞，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能在这里如期召开，这是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的光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盛事。广西民院建院50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各族师生员工奋发向上，艰苦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重视发展研究生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预科教育的多层次的办学格局。目前，我院在职教工1000多人，在校学生15000多人，有21个民族的学生在校就读，50年来我院共培养了65000多名毕业生，为广西各高校培养大学预科生8700多人。我院的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柬埔寨语等亚非语言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2001年，我院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被国家汉办定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学校”和“海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执行学校，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对外汉语水平考试。此外，我院是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党组授予的“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校”，三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被誉为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进步、繁荣和民族优秀文化的窗口，还获得全国花园式单位400强等荣誉。在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期间，希望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对我们学院的工作多作指导，多提宝贵意见，希望你们在广西民族学院生活愉快、一切如意！最后，祝愿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万辅彬为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开幕词

郝时远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

正值广西民族学院建校 50 周年大庆之际，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在风光秀丽、气候怡人的南宁举行，这不仅为广西民族学院的校庆增添了一份喜气，而且也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和繁荣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此，我代表本次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所有发起单位和全体与会学者向广西民族学院 50 周年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广西民族学院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而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 20 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在国内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研究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和显著成就，并以一种发展、繁荣的态势迈入了新世纪。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学界同仁在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人类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必须以开放的胸怀不断吸收、借鉴国际人类学界的优秀成果，通过双向互动的学术对话来实现发展。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举办，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这种对话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国内外（包括港、台）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平台进行交流与对话。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而且也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在此，我感谢广西民族学院的邀请

和给予我致词的殊荣，同时我也代表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预祝本次论坛举办成功！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在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影响下，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物种消亡的生态危机中感到生态失衡所带来的威胁，同时也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缺失会对世界和平造成的挑战，物种的多样性、差异性对自然环境的平衡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依托，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类的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文明与文化都是人类自身的创造，需要在交流、对话中实现理解和尊重，需要在共存、共荣中实现吸收和借鉴。中国的人文资源十分丰富，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将在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领域推动国际、族际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这正是中国人类学界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推动发展、创造繁荣的客观条件。

如前所述，中国的人类学尚不发达，需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需要吸收和借鉴国际人类学界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繁荣、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我们既要“拿来”，也要“送去”，“拿来”是为了推动这门学科在“本土”生根开花、有所成就；“送去”是为了实现这门学科在国际学术对话、吸收、借鉴中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本土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为了在国际对话中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学人资本。中国的人类学需要“本土化”，但是“本土化”的目的是实现“国际化”，不能够实现“国际化”的“本土化”不是成功的或科学的“本土化”。同样，“食洋不化”的“国际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因为“国际化”只能是双向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单向接纳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说，中国人类学界的发展繁荣依然任重道远。为

此，我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陆人类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同台、港人类学界，同整个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学在“中国—世界”这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繁育、结实做出应有的贡献。

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郝时远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重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探讨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和总结

庄英章 曾少聪 陈庆德等

一、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观察员评论

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02年5月13~1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论坛在会议的组织形式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组委会聘请了在人类学界较有威望的专家学者如庄英章、曾少聪、陈庆德、徐杰舜等教授做观察员，负责对在这次论坛学者们的学术发言进行评论。下面摘录的即是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的评论。



庄英章（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所谓的观察员评论，顾名思义就是针对这次论坛的形式与内容有所响应，提出一些个人的综合评论，以下就是我对这一次论坛的一些观察。

就像论坛第一天开幕式李亦园教授的贺电所提及：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至为活跃，聚会频繁，议题也相当广泛，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一个很

好的现象。这次论坛的发言，除了乔健、郝时远及张有隽等教授的三篇主题演讲外，还有近三十位代表的发言，题目很多样，甚至有几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听闻，这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也发现论坛的一般性论题稍多，比较具体的田野研究还是少一点，像张江华教授提到的本地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时间比较短，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大部分的田野研究论文，常常是只描写一个地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较少涉及理论的探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情况也一样，往往只针对田野地点做具体的描述，很少提出理论的建构。当然，提出理论的建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人类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能够先有一个理论的架构，然后到田野中收集资料，这样就比较能够掌握问题的核心。田野研究没有理论的指导，就显得缺少主题，不知道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张光直教授就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就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再根据考古及民族志材料，建构一个中国文明发展史的理论，以与西方文明发展史有所对话。他曾批评学者在建构社会科学理论之时，常把中国社会当作一个例外。他认为这是不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应当有一个普遍的原理、原则。

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区域性或泛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这里我简单举本次论坛的一篇文章为例子来说明，曾祥委先生的《东南宗族单姓村聚落成因研究》是一篇极为生动的论文，他的报告很有意思，例如他提到单姓宗族是由一个多姓村慢慢演变而来，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单姓大聚落，其过程是因大姓欺负小姓，小姓被迫改姓，然后变成大姓宗族的成员。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相当精彩，但曾先生的论文就这样结束，实在有点可惜。因为这样的现象即便在广东客家地区，福建闽西、闽南地区，甚至更远的浙东温州地区，都相当普遍，各有其类似性。所以一个个案研究内容虽然很生动，但如果没有观照到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那就无法进一步理论的探讨。从 1989 年开始，我和美国斯坦

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武雅士教授 (A. Wolf)，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所，还有台湾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合作，在福建选择 12 个县份共 36 个田野点（村落），分三年进行田野调查。后来我又提出一项华南农村研究计划，又继续了两年，福建多了几个点，浙江、上海那一带也有若干点，总共有五十多个村落。我发现这种单姓村落的现象很普遍，在我主编的《闽台社区的比较研究》论文集里面有好几篇就提到这种现象。我到过漳州的南靖县一个村落，是一个一万人口的乡，很多人聚在一起，到处都是土楼、圆楼，一个圆楼就是一个房，一个宗族的人们在里面建有公厅、祠堂等，系谱也很完整。我和厦门大学的同仁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当地大多是庄姓村民，我和他们同姓，因此被邀到祠堂祭祖，说我跟他们是同宗。后来我发现，当地其实有不少是非姓庄的改姓过来的，这种现象就曾先生所提到的例子，再进一步进行相关问题的比较，或先进行相关问题的回顾，然后提出一个解释，这样，起码就可以跟英国人类学家傅利曼教授 (Maurice Freedman) 的华南宗族发展理论对谈。如此，曾先生这篇文章的可读性大为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也就倍增了，甚至可以区别出在中国的汉文化研究中这个问题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现象。

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变异性那么大，这些变异是特殊的现象还是普遍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汉文化从中原一直往南迁徙，不断跟别的族群的文化相融合，到后来，到底什么是汉文化，什么是汉文化的核心，就难确认了。四年前我到新加坡从事广惠肇碧山亭坟山组织之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华人对祖先崇拜的那种热衷，他们虽然没有祠堂，但通过宗亲会的会馆，凝聚华人共同祭拜祖先，不管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年轻人也都来到坟山拜祖先。这种现象比起我在 1994 年江南地区访问时，所碰到的祖先崇拜现象，似乎新加坡的华人更加重视，扮演得更热烈、更活跃。如果说祖先崇拜所表现出的孝道是汉文化的核心的话，则有人会认为新加坡的华人文化比中国大陆更为核心，大陆反而是汉文化的边缘

了。所以，人类学通过区域性的研究，必须观照到比较的研究，才有可能提出一些理论的架构来，也才有可能跟西方的人类学理论相对话，这对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很有帮助。

再举台湾日据时期的户籍资料之研究为例，1905 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建立了一套户籍资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出生与死亡年月日、收养与婚姻事件、迁徙、缠足与其他记录等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斯坦福大学武雅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利用台北盆地的海山郡户籍资料进行不同婚姻形态与生育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提到童养媳婚的问题。在中国农村，童养媳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但有多普遍就难说了，方志上没有发生频率的记载。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也提到童养媳婚的现象，但也没有提到有多普遍，只是说有这种风俗。台湾因为有户籍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有些地方童养媳婚频率很高，像台湾北部地区的海山郡发生频率高达 20% ~ 40%，武雅士对这种现象提出生动而深入的解释。后来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巴博敦（B. Pasternak）也利用日据户籍资料分析，发现南部客家童养媳婚比例很少，他得出结论：武雅士提到的海山郡的普遍童养媳婚现象只是闽南人的例子，客家人则非如此。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武雅士和我一起合作，在台湾新竹地区及其他不同地区收集到更多乡镇之户口资料，并输入电脑，建立资料库，发现台北地区童养媳婚的比例很高，高达 40%，新竹地区约占 25%，中部地区大概 15%，愈往南部地区则越来越少，屏东平原已不到 5%。我们发现台湾的童养媳婚的分布呈现往北走的趋势，以北部地区为最高，我们因而提出婚姻市场的理论假设。台北盆地童养媳婚比例之所以很高，我们认为是因为 1880 年台湾开港以后，形成第二次的移民，由于樟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兴起，再次吸引了很多大陆来的移民，造成性别比例的极大差异，进而导致婚姻市场的压力。同时又因经济的发展，很多母亲纷纷收养女孩，以便将来给儿子婚配，如果生了女孩就送给别人。由于我们有全台地区的样本，因此可以看出一个模式来，哪些女孩

子会被送出去，什么情况下这个家又收养一个女孩当童养媳。根据详细的量化资料，我们所提出的婚姻市场假设，虽然不见得无懈可击，但起码我们建构了一个理论的架构出来。

1999 年起，武雅士教授和我又跟荷兰的耐美根那大学 (Nijmegen) 的历史人口学家 Theo Engelen 教授合作，从事台湾与荷兰的家庭、婚姻与人口比较之研究。荷兰在 9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建立户口资料，当然资料的内容没有台湾的户籍资料详细。记载没那么完整，但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的资料做比较，然后来验证琼·比格纳 (John Hajnal) 在 1956 年、1985 年所提出的欧洲婚姻模式。他从列宁格勒画一条线到意大利以西，这条线以西是所谓 European pattern，以东叫 Non-European pattern。欧洲模式的特征乃婚姻比例不是很高，结婚的年龄晚，生育率低，但所谓非西欧模式，结婚比例很高，结婚年龄低，生育率高。因此，他提出这样的两种婚姻模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把婚姻当作一个重点，以为控制人口要用婚姻，透过晚婚来降低人口增加率。我们认为婚姻并不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很穷，但每一个人都要结婚，平均结婚率相当高，平均结婚年龄很低，17~18 岁就结婚，生育率也相当高。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现象？根据台湾和荷兰的户口资料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 2001 年在荷兰开会，2002 年希望在台北再开一次会，每篇论文都是两个学者合写，一方面呈现荷兰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包括台湾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比较，如果能验证琼·比格纳所谓的欧洲婚姻模式，那么台湾户口材料的研究就可以提升到人类学或是历史人口学的领域，进行专家之间的对话。我想，这种比较研究是很值得推动的。以上所举的若干例子，在说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应建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历史档案资料，然后还要通过区域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以发现文化的特色。

最后，有关研讨会的形式，我也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这次大会安排论文宣读的时间太短，一篇论文宣读才 15 分钟，不能充分讨

论，常常发表人拖一下时间就过了，下面的听众也就没有机会发言了，实在不太公平。花那么大的力气组织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应该能够充分地沟通，论文可以多安排几天，当然这样会有经济压力。此外，研讨会的论文可以先定一个主题，在所定的主题下进行讨论，这样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如果能先交论文让与会者有机会先看论文，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当然，这需要一步一步地改进。类似的研讨会，先定主题，参加的人数可以少一些，讨论起来就更能发挥实质性的效用。 谢谢！



曾少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刚才庄英章教授提出中国有丰富的人类学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尽可能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与国际人类学界对话，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方向。现在，我要谈的主要是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首先，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较大，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 70 多位代表，欢聚南宁，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共同讨论人类学关注的问题。这次会议组织得比较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李亦园院士寄来贺信；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发来贺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亲临会议，特别难得的是请来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和庄英章教授。这次会议，徐杰舜教授和广西民族学院其他同仁组织得很好，徐教授的点子很多，在会议期间还举办学术沙龙、会议还安排观察员等，庄英章教授和我都是第一次当会议的观察员。

第二，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带来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例如郝时远教授《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应用与泛化问题》、乔健教授《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庄英章教授《试论客家学的建构》和张有隽教授《本土解释在人类学理论、方法上的意义》等论文，